

石嫣 / 著

从土地

到餐桌的变革

『新农人』变形记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联书店

Copyright © 2019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著作权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从土地到餐桌的变革：“新农人”变形记 / 石嫣著.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11

ISBN 978-7-108-06714-2

I. ①从… II. ①石… III. ①农业模式—研究

IV. ① F3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9) 第 230884 号

责任编辑 黄新萍

装帧设计 康健

责任印制 徐方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100010)

网 址 www.sdxjpc.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图文天地制版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9 年 11 月北京第 1 版

2019 年 1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1/32 印张 7.5

字 数 179 千字 图 120 幅

印 数 0,001—5,000 册

定 价 45.00 元

(印装查询：01064002715；邮购查询：01084010542)

推荐序

生态农业与环保农村

温铁军

本书作者石嫣是我的硕博连读的研究生，她去美国“洋插队”半年。回来后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也促使她进一步参与我们这些年艰苦奋斗的生态农业、环保农村的改良事业。遂为之序⁽¹⁾。

我国农业面源污染问题⁽²⁾

大家都知道中国的耕地只占全世界的7%，但很少知道中国耕地中“水土光热”等农业自然资源匹配的只占国土面积的9%。

这种基本国情矛盾制约下的经济规律是不可逆的：越是在农业资源短缺的情况下追求农业作为现代产业的增长，其结果就越会导致化学品等各种投入的增加，投入产出就越不合理，农业和农村也就越失去可持续的基础。

(1) 推荐序作者是中国人民大学学术委员会副主任、福建农林大学新农村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西南大学中国乡村建设学院执行院长、北京大学乡村振兴中心主任，曾在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工作，先后担任过多个国家级项目首席专家。本文写于2012年。

(2) 指农村生活和农业生产活动中，溶解的或固体的污染物，如农田中的土粒、氮素、磷素、农药重金属、农村禽畜粪便与生活垃圾等物质，在非特定的地域，在降水和径流冲刷下，通过农田地表径流、农田排水和地下渗漏，使大量污染物进入受纳水体（河流、湖泊、水库、海湾）所引起的污染。

目前我国农业面源污染从现象上看主要是农业的化学化造成的。例如,我国农药年产量和使用量均高居世界榜首,年生产近百万吨,居世界第二,但其中几乎没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农药市场上的主流产品大多数是发达国家禁用的;高毒的杀虫剂占总产量的 56%。我国年均化学防治面积 45 亿亩次;因大量使用化肥和农药而污染的土地超过 2187 万公顷,约占耕地面积的 16%。全国每年施用量已突破 130 万吨(成药),以播种面积计,几乎是世界平均水平和发达国家用量的 2 倍⁽¹⁾。据部分省市数据,蔬菜中农药检出率达 54%。这是因为植物保护是需要大面积实施才能见效的技术推广,不可能靠小农经济完成;但在我国绝大多数农民购买农药是通过私营个体渠道。约半数农民不能合理使用农药,只有 3.57% 的农药使用是由技术人员操作的。此外,我国农药残留标准仅 400 多条,而欧盟有 27000 多条,日本有 9000 多条;目前蔬菜农药残留监控计划只不过覆盖 37 个大城市,占全国城市的 5%⁽²⁾。

再如,我国化肥年使用量已突破 4000 万吨,居世界之首,单位播种面积化肥用量约为世界平均水平的 3 倍,已成倍超出发达国家为防止水体污染所设置的安全上限值⁽³⁾。我国湖泊与河流中的污染负荷有 50% 以上源于非点源污染,来自农业面源污染的约占 1/3;但在上海、浙江这类农业产业化发达地区,工业污染负荷只占杭州湾总负荷的 10%,另外 90% 都来源于农村和农业面源污染;此外,仅以占全国作物总播种面积 20% 的集约化、专业化的蔬菜、瓜果、花卉种植区域,每年因氮肥的不合理使用而损失氮就达 300 万吨,占我国氮化肥总用量的 12%。大量使用化肥已经引发全方位立体污染、农产

(1) 平均每亩(667平方米)用量接近1千克。

(2) 摘自“我国农药使用现状调查和对策建议”(2005—2006软科学要报汇编,pp.222-232),原载2004年国家软科学计划项目“应对国外农药技术壁垒的对策研究”,2004DGS1B001。

(3) 我国单位播种面积化肥用量高达 $400\text{ kg}\cdot\text{hm}^{-2}$,是世界平均水平的3倍,几乎是发达国家为防止水体污染所设置的 $225\text{ kg}\cdot\text{hm}^{-2}$ 的安全上限值的两倍。

品质安全问题难以逆转，其产生的温室气体对气候变化产生严重负面影响。

还如，我们国内大城市前些年形式主义地搞“市长菜篮子工程”，投资上了万头的猪场、牛场，也同样造成规模养殖业的面源污染。

农业污染问题的本质尤其值得关注

这些现象虽然在 2003 年提出科学发展观之前就已经是不争的事实，但却并不能归罪于中国农民采取了不适当的农业生产方式。客观地看，这是很多地方大力推进效益目标的农业产业化的后果之一，在过去单纯追求 GDP 的“非科学发展观时代”，这些教训都被成绩掩盖了。

我们是在人口增长造成对农产品的客观需求增加的同时，进入了庸俗化的市场经济初期阶段，一方面是社会盲目地推崇消费主义，从而造成世界罕见的食品浪费；另一方面盲目招商引资、加快城市化，造成土地资源不断被大量占用。再加上在小农分散经营的制度条件下只能放弃集体化时期主要采集天然来水和地表水用于灌溉的农田水利建设方式，改为财政补贴分户打井灌溉，当然会导致地下水资源被过量开采。这两个方面共同作用的结果，就是在农业资源日益短缺的情况下农业增产与面源污染进入恶性循环。

此外，如果中国继续按照西方模式搞农业现代化和产业化，享受政府优惠政策，进入农业的企业一般都会追求规模经济效益。从西方经济学理论来说，这当然有足够的合理性，但如果从可持续发展所需要的循环经济和综合效益来看，越是规模化大型现代种植业、畜牧业，造成的污染越严重。比如规模化、产业化的粮食、棉花生产，必然要大规模施用化肥、除草剂；越多地改用化学农业，造成的污染和农产品质量安全问题越严重。近年来蔬菜、瓜果中的硝酸盐、亚硝酸盐超标严重，产品品质下降、食品致病等等，均与商品化和化学化、规模化和产业化的农业现代化相关。就在同期，我国 5 年来某些农药产品产量增长幅度超过 130%，其中化学合成产品 2005 年利润增长幅度超过 45%；这些都直接表现在 GDP 和利益分配上，自然而然地

成为官、产、学、媒联合推进“非科学发展观”的利益背景。

在新时期贯彻新战略的时候，需要反思最近 30 多年来的农业政策：它一方面确实有利于产量和效益目标，但另一方面，也确实进一步破坏了城乡生态，造成了严重的食品安全问题。看来，只要各级政府尽快把财政补贴从支持化学化、产业化的农业改变为支持农户使用农家肥的有机兼业农业，只要下决心把在城市事倍功半的环保投资少部分地改变为新农村建设的农村环保投入，农业面源污染这个全球性难题就能在中国解决。而现在之所以不能改变甚至难以讨论的根本原因，也在于某些部门或政府官员与产业资本的利益关系过于紧密。

这些污染和食品安全问题，按照最时髦的西方制度学派理论，都应该属于所谓农业现代化这种制度造成的“负外部性”⁽¹⁾。

新农村建设应该突出强调生态农业和环保农村

无论是强调科学发展观，还是强调生态、环保，都应该尽可能把重点转移到农村去，结合新农村建设推进生态农业和环保农村。我们最近这几年提出的看法仅供参考。

我国资源紧张条件下的弱势农业也被迫追求 GDP，不过是最近二三十年的事，因为给定的目标仍然没有超越“大跃进”式的思维，即西方发达国家都已经实现的农业现代化。的确，欧、美、日都实现农业现代化了。但是，这个现代化成功吗？我在国际上到处寻找，始终也没有看到发达国家农业现代化的典范。

所以，如果愿意反思，那么可以提出的第一个挑战是：到目前为止，发达国家所实现的农业现代化，由于造成对生态和环境的破坏，在可持续发展

(1) 据此，西方学术界推出了“环境经济学”这门新学科，所提出的主要解决办法是“排污权”拍卖。但这种办法对于在世界上都属于弱势产业、需要政府补贴的农业而言，特别是对中国这种高度分散的小农经济，客观上难以适用。

的意义上，不应该被认为是成功的。据此，如果我们确实打算把科学发展观落实到“三农”工作领域，应该强调的就是生态农业和环保农村。

就现在的条件来看，中国和美国之间的农业差别太大，农业领域的根本制度是不可以照搬的。美国农业主要是靠拥有大面积土地的 17 万个农场主，而中国的农地上密密麻麻地分布着约 380 万个自然村；特别是那些平原地区的农村，往往是上千人甚至几千人聚居在一个村里。如果我们也按照美国农业追求规模效益的方式搞，其结果恐怕很难乐观。但如果止步于维持小农经济，那也很糟糕——在土地资源短缺的条件下追求细小单位面积农业的高产，其结果仍然是化肥、农药、除草剂的大量投入。

从民航客机上，我们能鸟瞰黄淮平原，很多地方被大片青灰色覆盖着，那就是地膜覆盖或者塑料大棚。在没有全面使用可降解的农膜之前，塑料薄膜都会污染土地；只要是大棚覆盖，基本特点都是高耗水、高化肥、高农药、高除草剂，这已经造成华北平原地下水过量开采超过 80%，再加上过量施用化肥导致地表土壤板结，沙化将是必然的结果。有些著名蔬菜产地由于大棚里的土壤被严重污染和有机质丧失而不得不挖地三尺以换掉棚内土壤！

如果说 20 世纪沙尘暴来源于蒙古高原，那么，21 世纪很可能来源于黄淮平原。曾经有人说过，一只蝴蝶在亚马孙森林振动翅膀，就会引起太平洋的风暴。将来的中国，也许一个小孩在华北跺跺脚，就会引起北京的沙尘暴。

近年来，为了试验科学发展观提出的“循环经济、有效经济”，北京梁漱溟乡村建设中心的志愿者们已经筹备组建了绿色合作联盟，郑州的花园街道也开始从帮助兰考农民卖健康大米，进一步与南马庄村形成了城乡社区结对互动。北京的“国仁城乡合作中心”宣布成立；在本书作者与其他 5 位中国环境大使发起，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许嘉璐、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副主任张治以及 2006 绿色中国年度人物获奖者廖晓义等联名签署的

“文明消费倡议书”发布之后，很多大学生志愿者们深入社区，发动城市居民组建消费者合作社，帮助农民的生产合作社与市民的消费者合作社直接谈判，让农民能够以合理价格销售健康食品。接着，本书作者石嫣接受国际组织的安排到美国做了一个学期的参与式社区支持农业（CSA）的研究，即俗称的“洋插队”，在美国就引起很多关注，归国后也得到国内媒体和各地干部群众的重视。这个时期，我们与北京市海淀区联合建设产学研基地的有机农业和市民农园实验点（小毛驴市民农园）也在后沙涧村的土地上诞生了。

如同我们2002年配合十六大开始了新农村建设试验一样，相信再有三年，通过城乡良性互动来形成有效经济的试验也会产生初步的经验。

自序一

我的“洋插队”生活⁽¹⁾

对于大多数中国的年轻人来说，“插队”这个概念是陌生的，尤其是对于我这样从小生活并成长在城市中的孩子。最初了解到“插队”这个概念是从父母那里，爸妈都是下乡插队的知识青年，因插队而相识并结合。日常生活中，也常常听到父母讲述那段生活经历以及其间发生的故事。更多地了解“插队”是从我的导师温铁军先生那里。跟随先生读硕士、博士五年多的时间里，他的一言一行，无论做人还是做学问的实事求是、知行合一的精神，无不渗透着11年基层生活对他的影响。

“插队”这个概念来自于上世纪60年代。1966年“文革”爆发后，中国的社会陷入了一种特殊的状态，城市里的就业机会大幅度降低，于是从1968年开始，有2000万城市里的青年知识分子和干部以插队落户为名到乡下劳动。毛主席发出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

尽管现在这些知识青年对当时那一段经历有不同的评价，对于那一段“激情燃烧的岁月”，有人认为几年的插队生活耽误了他们人生中最美好的时

(1) 本书旧版名为《我在美国当农民——“80后”的“插队”日志》，2012年出版。本文为旧版序。——编注

光，有人认为那是一种生活中不得不做的选择，但是，对于中国广大的农村来说，他们的到来却带来了巨大的改变——农村有了赤脚医生，有了给孩子们上课的老师，有了知识青年带来的新鲜事物，有了对于农田水利劳动力的巨大投入……很多东西至今还发挥着很大的作用。

但是现在，当我们提到农村时，更多的年轻人想到的还是当年晏阳初想到的那样，农民是“愚、贫、弱、私”，农村是荒芜和衰败的代名词。而那些由于种种原因进城打工的农民，更是不能得到和市民相同的国民待遇。城乡之间的二元结构造成的城乡之间的鸿沟被体制和人为的原因越拉越大。生活在城市里的人每天面对着的是水泥的森林、柏油的沙漠，孩子们更是“五谷不分”，我们逐渐失去了对生养我们人类的土地的感情。对于我们所吃的农产品，我们不知道它们从何而来，又是谁种植了它们。我们想到更多的是如何从农村走出来，如何在城市中更好地生存下去，如何让自己的钱包更快地鼓起来。

如果一味强调城市的发展，而忽视了城乡之间的和谐，城市就变成了一个解不开的困局。生活在城市里的人就像井底之蛙，难免一叶障目，看不到自己生活在城市的代价是什么，比如垃圾流向了何方？又给那个地区的人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现代城市成为一个源源不断对外制造麻烦、转嫁成本的地方，而农村也由本应在从城市到乡村、从乡村到城市这个循环链条中起到涵养环境、保持水土的作用，变为消化城市转移的垃圾、污水、废品的地方，也因此，如今，农业的立体污染已经成为中国污染中比例最大的污染。同时，食品安全问题层出不穷。在我们所追求的全球化自由贸易的大潮流下，我们餐桌上的一道菜可能经过了几万公里的运输，在包装、运输等环节可能会出现大量的营养流失和污染。同时，农民在农产品销售的最终利润中所占的份额越来越少；为了在有限的土地上提高农业收入，就要增加产量，于是逐年追加化肥和农药的用量，从而导致恶性循环。

似乎有一天，我们突然发现，我们吃的蔬菜、水果、馒头、米饭、肉都

不知道是否安全，从种植、养殖到餐桌的过程，充斥着各种农药、化肥、添加剂、激素……近些年来，每个人都注意到癌症、白血病等以前的罕见病的发病率逐年增高，虽然没有确切的数据表明这与我们饮食中所含的化学物质相关度有多高，但我们确实可以体会到近 30 年来的变化与这方面的内在联系。据新华网报道，在不到 20 年的时间里，我国癌症发病率上升 69%，死亡率增长 29.4%，全球每年约有近 1000 万人新患癌症，每年约有 500 多万人死于癌症，也就是说大约每隔 6 秒钟就有一名癌症患者去世。与此同时，各种“富贵病”，如糖尿病、脂肪肝的患病率也迅速提高。

传统上的中国农村是一个共同体社区，原本起着“蓄水池”的作用——可以和城市的发展形成良性的互动，在城市遇到各种危机的时候，帮助城市“软着陆”。由于乡村是一个与外界关联很少的、相对封闭的社区，农业生产者拥有两种选择的力量：首先，农民可以选择农业生产的体力劳动的过程，包括种什么和种多少，以及投入多少。当然，这些选择总是受到当地气候、土壤的情况的限制和本地农产品市场的自然条件的限制。其次，农民是商业产品生产者的天然竞争者，因为他们可以选择自己保留种子、使用畜力和自己的肥料。

但，这样的乡村越来越只存在于相对偏远的地区，很多地方的乡村就像皮影戏中的皮影，双手和双脚都被外部力量控制着，工业资本已经夺取了农民对农业生产的控制权，迫使他们最大化投入，以匹配一些有能力决定价格的购买者的需求。伴随着农民逐步丧失对农耕的投入、进度的控制权，以及将产品销售到市场的能力，农民成为被大资本决定的食品系统链条中的一个环节，而这个链条的最终产品与生产者的距离越来越远。种植中的传统智慧基本被现代的农药化肥企业的技术所代替；农民的教育、医疗也依赖于复制城市里那一套高成本的体系。由于大部分优质资源都集中在城市里，大量农村中青壮年进城务工，很多农村成为空心村，只剩下妇女、儿童、老人（所谓的“386199 部队”），农村似乎真的向我们想象中的衰败走去了。

我们到底要什么？这似乎越来越成为“生存还是死亡”的问题了。

农业耕作的过程是体力劳动的过程，如将原材料——种子、水、肥料投入到初级产品——谷物、蔬菜和牲畜中。但体力劳动并不是农业生产的全部特征，农产品系统更不是简单的农业生产，它包括农场的经营、生产、营销，也包括产品的运输、加工和营销。尽管体力劳动在农业食品生产的链条中是一个必需的过程，但农场的投入和农业的产出并转化为消费者的商品，这样一个食品系统开始逐步控制了农业经济。

20世纪初，农民可以获取农产品销售的40%，大部分投入形成的产出直接在农业的再生产中以种子、饲料、粪便和绿肥的形式表现出来。但是到20世纪末，耕作本身只能获得相当于农产品销售的10%，另外25%为农场的投入，而剩下的65%则被从农产品到消费商品的运输、加工和营销过程所获取了。而那些投入到农场中的原材料、劳动力和资本，现在则用来购买商品化的种子、拖拉机和燃油，用机械和人造化学品来替代劳动力。

因此，农场生产和产出的转变为工业资本获取农业的利润创造了机会。正像其他工业加工过程一样，农业机械、化学品、种子和小麦转变为我们在超市所购买的麦片的过程，就被资本及其需求所控制了。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深刻地阐述了这个转变带来的社会影响。到19世纪60年代，马克思的研究开始专注于土壤养分的循环和资本农业的剥削特质。他在《资本论》第一卷中写道：

资本生产，混乱了人与地球的新陈代谢，所有资本主义农业的努力不仅仅是吸食工人而且吸食土地，所有的努力的增加肥力都是朝向毁坏更多长期肥力的来源。因此，资本主义生产发展了科技和社会生产的程度，而与此同时不断侵蚀了财富本来的来源——土壤和工人。

马克思在《资本论》的地租理论中系统地阐述了这个论点，并且在他的

著作中第一次提出“生态可持续能力”的概念。

在 21 世纪的今天，世界食品系统的各个方面都在发生着快速而巨大的变化，这个系统不仅包括那些耕作的农民，还包括那些大型的农业企业。这些企业提供给农民种植中的一切投入，从种子、化肥到拖拉机和燃料；再大一点的农业企业甚至提供包装和运输服务。农产品的世界贸易已经开始几个世纪了，而如今大型农业企业控制、主导了农产品的世界贸易，从而加速了这个过程。资本的集中给人类提供了不断增长的食物产量，甚至是过剩的。可是另一方面，纵观世界，更大的问题表现在：少数农业企业控制了食物生产的各个环节；农民在使用农药时存在安全问题；转基因动植物、微生物的广泛传播对于环境产生负面影响；对不可再生资源越发依赖；农民收入、生活条件差，动物福利极低，饥饿还在不断地蔓延，可食品产量的增长目标却不是为了人类的生存，不是为了减少饥饿，而是利润的增长！

难道我们就无能为力了吗？这个世界总是有人可以跳出制造问题的思路，另辟蹊径去寻找解决问题的钥匙。

社区支持农业（CSA）在 20 世纪 70 年代初最早出现在日本、德国、瑞士，最初的出现就是基于对食品安全的关注和在城市化过程中对土地的关注。在社区支持农业模式中，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建立一种风险共担、收益共享的关系，消费者会预付生产费用，与生产者共同承担在来年农业种植过程中可能会出现风险并支持使用生态可持续的种植方式。与以往的收益方式不同，生产者在季节之初就获得了这一年种植的收益，并且这部分收益对生产者付出的劳动来说是公平的，而与此同时，消费者也获得了有机种植的健康农产品。在这里，社区是指在一定地理区域范围之内有共同消费理念的一个群体，这个群体所支持的农业生产方式对人类的发展是可持续的。有人曾经这么描述社区支持农业：“CSA 是一种类似物物交换的方式，就是你今年用钱支持了一个本地的农民，来年可以获得免费的农产品。”

2008 年 4 月 18 日，在得到了学校的支持后，通过美国农业贸易与政策

研究所（Institute for Agriculture and Trade Policy, IATP）的帮助，我来到了美国明尼苏达州的地升农场（Earthrise Farm），开始了我近半年的美国农民生活。在这里，我真正成为了一名农民，每天和他们一起劳动——从种植到收获，从农场寻找社区成员到配送这些农产品到社区中，从浇水除草到采摘。与此同时，我的身份还是中国人民大学的一名研究生，我不仅要劳动，同时还要观察、访谈，从另一个角度来做我的研究。

或许是因为目前中国学生出国大多选择到大学学习，并且每次提到美国的农业，大农场、高度机械化就认为那是农业现代化的典范，而我作为一个博士研究生，却是到美国的一个小型生态农场当农民，而且是整半年的时间，这在大多数人眼里是不可思议的。温铁军先生说我是第一个中国公派到美国“插队”的研究生，意义是很大的。有人说这是“划时代的”。但从我内心来说，我喜欢这样的生活，享受这样的生活，并且相信“实践出真知”这句对于我们研究农村问题的人来说更是要遵循的原则。我真实地面对现实，而不是矫情地钻在书本中。一个人的一生中或许很难有几个这样的半年吧。

这本书的内容，是我对半年“洋插队”生活的回忆和总结，本书以我的故事为线索，穿插了很多我对于这种参与式研究的思考。希望通过这本书，有更多的人参与到这场食品运动中来，爱护我们的土地、珍惜现有的资源，让地球母亲可持续发展。更希望以此引发对现有的一元发展观的思考，激励更多的年轻人看到人生多样生活的选择，看到我们所应肩负的社会责任，以积极的态度面对人生的挑战。

自序二

我在中国当农民⁽¹⁾

十年前，我曾说自己有个推动健康食物系统的梦想；十年后，可以说，我很幸运地见证了这个变化的历史过程。

2008年从美国回国后，我真的当了农民。

先说说从业十年遇到的尴尬吧：

我去银行办事，在开通手机银行的单子上填职业一项：农民。柜员说：“没有这个选项，要不写‘职员’吧。”需要修改职业内容，这不是第一次了。

参加活动，每次听主持人介绍嘉宾：这位是著名的教授某某，这位是某某医院的医生，这位是著名的节目主持人某某，但介绍到我就是：石嫣，是人民大学的博士，现在经营自己的农场。

有一个小伙伴，刚来农场实习没多久，母亲就直接来农场把他带回家来了，母亲无论如何也接受不了儿子又做农民了，那是他们一辈子都想摆脱的身份。

去韩国首尔大学开会，一个大学教授有些轻蔑地问我：“你做农民收入能维持生活吗？”我回答说：“跟做老师的收入差不多吧。”教授有点惊诧，

| (1) 本文写于2019年。——编注

说：“这对农民来说是好事，对教授来说不是好消息。”

爸妈在城市生活时间久了，每次来我农场，都要带很多吃的东西来，村里只要有沿街叫卖的小贩，老爸就会跑出院子去“购物”，农场里有这么多菜和粮食，他们还是觉得我吃不上啥，觉得我在“荒郊野岭”很孤独。

2006年，我在中国人民大学读研，师从温铁军老师。我开始到越来越多的乡村做调研，了解了我们看到的光鲜食物从哪里来。现在留在乡村的主要人群是我们称作“386199部队”的妇女、儿童、老年人。可是农业其实也是在保护水土这些人类的公共品，我觉得很难在农民艰难求取生计的同时再要求他们承担更多的责任，我们需要更多年轻的力量回到乡村，承担责任和改变现状。而我们论文中的那些政策、建议真正落实到基层，就需要更多有力量的人去执行。再回到学校时，我愈发觉得做论文已经很难解决我的困惑了，我在想：我有没有可能不再把农民和农村只作为我的研究对象？我有没有可能成为他们中的一分子，去改变现状？

美国“洋插队”

2008年，一个偶然的的机会，美国一个研究所需要找一位语言能力比较强、有一定研究基础的人，去一个农场实习半年。通过跟农场主一起生活、工作，更深入地了解美国的社区支持农业（CSA）的模式。这个模式简单一点说，就是农场和消费者之间建立直销、互信、友好的关系，让生产者有稳定的市场保障，让消费者吃到健康的食物。消费者预付的定金作为农场主生产的“投资”，这种模式让中小型生态农场的生计得到更好的保障。

实际上，短暂的“洋插队”并没有让我学到多少农业技术，后来自己经营农场，才感觉中国农民更懂得如何在小块土地上获得更多收成；也没学到多少农场经营的管理经验，因为美国的那家农场只有33个会员，每周只需要配送到附近几个小镇上的配送点，由会员自行取菜，而现在我的农场的会